

## 破与立中的中国模式

潘维

摘要：中国成功挑战了经济学的“市场与计划两分”，社会学的“国家与社会两分”，政治学的“民主与专制两分”。中国模式可以分解成三个子模式。由四大支柱构成的“国民”经济体现独特的经济模式；由四大支柱构成的“民本”政治体现独特的政治模式；由四大支柱构成的“社稷”体制体现独特的社会模式。社稷、民本、国民“三位一体”，构成了独特的“中国模式”。归纳中国模式将促进“中国学派”的崛起。

### 何为“中国模式”

什么是模式？与“描述”历史道路不同，与总结历史“教训”也不同，模式是对“成功”之路的“归纳”。

什么是中国模式？中国模式是关于人民共和国六十年“成功之路”的理论解释，即因果抽象。总结中国模式，前提是认同共和国的六十年取得了成功。

中国模式从哪里来？中国模式不是天上掉下来的，而是来自中华的百年奋斗史、三千年王朝史、五千年文明史，还包括被消化为中华文明有机组成部分的外来文明。中国模式的基础是中华文明的延续性。

有学人说，模式是固定的，中国的六十年是大变迁的六十年，而且依旧处在变迁之中。“改革”方兴未艾，何来“中国模式”？然而，世界向来变动不居，正因为世界变动不居才需要理论知识。固态的理论来自动态的历史，解释动态的现在，启示将来的行动。换言之，模式为现实提供定义，为比较提供知识，为未来提供指南。

世上各种“模式”此起彼伏，从来没有永恒的成功。中国模式或许也会因为中国未来的失败而被淡忘。然而，总结今天的成功有助于认识昨天的失败，规避明天的失败。“中国革命”的成功被概括为拥有武装斗争、群众路线、党的建设、统一战线等“法宝”。背离这“模式”，中国革命就遭遇失败。中国革命如此，共和国的发展亦如此。世界上最大的民族成功地走过了六十年，却不能给人类贡献一点新鲜的知识？只有缺乏自尊才会如此断言。

还有学人说，中国的发展成就是以巨大代价换来的，不足为外国效仿，谈何模式？总结中国模式并不是为了供外国效仿。中华文明是取经文明，不是传教文明。形成中国发展模式的历史代价确实沉重，但世界上不存在没有代价的成就。美欧模式、苏联模式、日本模式，也都付出了沉重的历史代价。历史明确记载着殖民战争，对印第安人的种族灭绝、贩奴蓄奴，两次血腥的世界大战，直到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中期还“合法”的种族隔离，更有延续迄今不断的侵略战争。

更有些学人会说，既然今天的西方就是中国的未来，何必费力总结中国模式？在这些学人眼里，共和国的前三十年是失败，后三十年是成功，而从失败到成功是因为“补课”和“接轨”，因为扭头走上了“普适”的西方道路。这种判断不仅浅薄，而且危险。迄今没有哪个后发国家成功地复制过西方模式。西方模式的基础是侵略性的军事、政治、经济机器。这个基础，中国不曾拥有，也永远不应该拥有。中国的复兴在于闯出了一条独特的道路。几代人前仆后继，浴血奋战才完成的中国革命不能否定。忘记历史意味着轻薄，篡改历史意味着背叛。

中国自古就是世俗国家，不依赖从纯概念出发的逻辑思辨，而靠实事求是。近年来，因为迷信西学教条，中国出现了很多问题。正如过去反对迷信苏联教条，今日中国的迫切任务是反对迷信西方教条，防止洋教条把我国导入陷阱。

**中国的成功挑战了经济学的“市场与计划两分”，社会学的“国家与社会两分”，政治学的“民主与专制两分”。总结中国模式能够提供新鲜知识，促进我国学界对本土文明的自觉，促进“中国话语系统”的形成。在这个意义上，归纳中国模式将促进“中国学派”的崛起。**

抛砖引玉，在笔者看来，中国模式可以分解成三个子模式。由四大支柱构成的“国民”经济体现独特的经济模式；由四大支柱构成的“民本”政治体现独特的政治模式；由四大支柱构成的“社稷”体制体现独特的社会模式。社稷、民本、国民“三位一体”，构成了独特的“中国模式”。

## 中国模式的表层：经济模式

经济成就是中国成功最明显的体现，也是中国模式的表层。

一切经济模式都包含四个基本要素：劳力、土地（生产资料）、企业、资本。

“四大支柱”可以解释中国经济的成功。这四大支柱是：1. 国家对土地（生产资料）的控制权；2. 国有的金融和大型企业和事业机构；3. （以家庭和社区中小企业为基础的）自由

的劳动力市场；4.（以家庭和社区集体中小企业为基础的）自由的商品和资本市场。这四大支柱是由“国”与“民”两大部门构成的，故称“国民经济”。

1. 国家对不可再生的土地（生产资料）的控制权有如下功能：（1）（通过耕地和房基地的平均分配）维持了中国农村社会的稳定。（2）维持了人民对生产资料占有的相对公平。（3）维持了工业经济的低税率。（4）维持了工业基础设施建设的低成本。

2. 国家拥有金融和大型企业和事业机构有如下功能：（1）使国家金融体系稳定、专注地服务于工业生产，防止金融部门异化为独立的吸金帝国，甚至被外部的金融帝国操纵；还使国家拥有了实施市场宏观调控的有效杠杆。（2）国有工业部门专注建设昂贵的、民营部门难以承担的工业基础设施和高科技及国防工业，并建设和掌控拥有天然垄断性质的民用基础设施以维持其价格稳定，还因此获得与西方巨大的寡头企业竞争全球资源的能力。（3）组织建设了教育、科研、卫生、体育、文化等民营部门难以承受的非盈利部门，使之迅速发展和繁荣。

3. 以家庭和社区中小企业为主体的自由劳动力市场有如下功能：（1）保障广大劳动者获得相对平等的就业机会。（2）保障劳力的低成本暨国际竞争力。

4. 以家庭和社区中小企业为主体的自由的商品和资本市场有如下功能：（1）保障竞争的效率。（2）保障社会平等，维持了“富不过三代”的非阶级社会传统。（3）保障供应的弹性，以适应市场风云变幻的需求。

如此，四大支柱分成两部分，一部分是占经济规模四分之一左右的国有部门，另一部分是占经济规模四分之三左右的庞大民营部门。“国”与“民”两部分功能不同。两大部门互为补充，互为支撑，协调发展，是为“国民”经济模式。

中国经济模式是独特的。国民模式不是苏联式的“产品经济”，因为不依靠“全民所有制”。国民模式不是英美式的“市场经济”，因为不以私有产权为基础。国民模式不是西北欧的“社会市场经济”，因为不支持高税率、高福利。国民模式更不是德国和日本史上的“国家资本主义”，因为中国经济没有被少数大型私有企业主导，大型私有企业也不是中国劳动力的主要雇主。中国经济是“国”与“民”相互支撑的经济，官称“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”。

官民协作的国民经济模式成功缓解了计划经济缺动力、市场经济缺情义、福利经济缺效率的问题，空前地调动了全国工商业劳动者的积极性，刺激了企业间的激烈竞争，带来了物质生产的极大丰富，使小农中国的工业化得以高速推进。

这个官民合作的经济模式当然有缺陷，也说不上比其他模式“高明”，因为各国的政治

社会历史前提是不一样的。任何一种经济模式，在地球五分之一人口面前，在城乡差距，在从南到北、从沿海到高原的巨大地域差异下运作，都会漏洞百出，弊端丛生。

我想说明的是，任何经济模式的形成都不是偶然的，而是具体的国情条件使然，是长期“试错”的结果。重要的是：中国的国民经济模式已经成型，是走向胜利的模式。中华一贯的思想方法是实事求是。一部分学人指责中国搞资本主义，另一部分学人指责中国坚持社会主义，可谁又能否认中国创造了“经济奇迹”？在活生生的事实面前，“进口”的意识形态概念就是如此的苍白和尴尬。中国的成功应当催生自信的“中国派”。

### 中国模式的中间层：民本政治

中国官民合作的经济成功显然不可能脱离政治解释。在笔者看来，“民本政治”是国民经济的基础，是中国模式的中间层。民本政治垮了，国民经济就崩溃。

所有政治体制都包含四个基本要素：政府与人民关系的主流意识形态；政府组成人员的选拔方式；行使政府权力的主要机构；预防和纠正政府错误的机制。

“民本政治”由四个支柱构成：1. 现代民本主义的民主理念；2. 强调功过考评的官员遴选机制；3. 先进、无私、团结的执政集团；4. 有效的政府分工制衡纠错机制。从功能上看，民本政治的“四大支柱”是有机地联系在一起的。现代民本主义的民主理念指导核心执政集团，核心执政集团维持绩优选拔和分工制衡。抛弃了民本观，后面三个支柱就会相继垮掉。

从性质上看，中国政体不是西方议会政党制，因为先进无私团结的执政集团是中华政体的核心。政体功能最强大的部分来自执政集团，最脆弱之处也在这个集团。当这个集团先进、无私、团结，整个中华民族就势不可当。当这个集团丧失民本理念，官员谋私，涣散分裂，就会脱离人民，导致“群龙无首”，一盘散沙，被人民推翻，直至诞生一个新的“先进、无私、团结”的执政集团。

从结果看，尽管民本模式有很多缺陷，但适应国情，并不“落后”于西方的“自由民主制”。六十年来，民本政体相当出色地满足了“百姓”眼下和长远的需求、部分和整体的需求，以及既要发展又要安定团结的需求。

中国革命的幼稚时期曾接受“共产国际路线”，导致了惨痛的失败。全盘接受“西方民主教”，另起炉灶搞拆故宫建白宫的“政治体制改革”，鼓吹党争，会大幅降低我国政府的质量，无中生有地制造社会分裂，导致政治倒退(political decay)。审视大中华区各政治实体间的共同点和差异，我们可以检验上述结论。结论有三条：第一，强大的先锋党是根本，能维持行政主导，建设并巩固法治。第二，西式的竞争型选举政治能分裂执政党，摧毁行政

主导，削弱法治。第三，与新加坡和香港政体相比，中国民本模式里的法治不够健全。

从可持续性上看，如果中国共产党能避免落入台湾式的选举陷阱，厉行法治，走群众路线制止腐败，民本模式可望完善、持久。

### 当代社会组织模式：社稷体制

中国的社会特征催生了一个独特的社会组织体制。社会体制是中国政体独特性的直接原因。反过来，中国政体的质量也为中国社会体制的质量提供保障。笔者称中国当代社会组织模式为“社稷体制”。

“社稷”初指“民以食为天”，拜五谷神的庙堂，后亦泛指官民在利益和意识上的统一体，介乎“民”与“君”之间。孟子说，“民为贵，社稷次之，君为轻”。社稷不同于西方的“国家与社会”两分。社稷系于物质福祉，亦系于伦理精神，较适合描述中国官民互动的“责任”机制。在社稷中，官与民不是所谓“国家与社会”孰大孰小，孰强孰弱的关系，而是鱼与水，骨与肉的关系。官民之间离心离德，社稷就分崩离析。

国民经济是中国模式的表层，社稷体制是中国模式的核心层，民本政治居于两者之间，是关键层。社稷是民本的源泉。但“民本”政治垮了，“社稷”也会分崩离析。

中国社稷体制由四大支柱构成：（1）家庭而非个人构成社会的基本单元。（2）（以家庭为单元的）平等的社区和（工作）单位构成了中国的社会网格，与西式分层的“市民会社”（civil societies）大为不同。（3）社区和单位与“条条、块块”构成的行政网格天然重合，在基层彼此嵌入，相互依存，形成弹性、开放的“立体网格”，即社稷。（4）家庭伦理观渗透社会组织 and 行政管理的逻辑。

西方的市民会社与中国立体网格的社稷都使得社会有组织、有秩序。但不同之处也很明显。市民会社由个人构成，社稷由家庭构成。市民会社的基础是阶级和社会分层，社稷的基础是平等的社区和单位。市民会社的内外纽带是法权，社稷的纽带是家庭伦理。市民会社是集团利益博弈的依托，社稷内的单位和社区也相互竞争，但家庭为自身福祉“择木而栖”，自由流动。市民会社与国家有清晰的“群己权界”，维持权益争夺的动态平衡，社稷官民一体、公私一体，维持官民距离远近的动态平衡。

比起“国家与社会”两分，社稷体制未必落后。个人至上比家庭至上更先进？分为上、中、下层阶级的市民会社比平等的社区和单位更能鼓励社会流动？契约法理比家庭伦理更公正可靠？国家与社会界限分明比官民复合的社稷更自由？集团与集团斗，社会与国家斗，会使中华的政府抛弃民本观，背离人民，会使中华社会分崩离析。官民有共同的理念和目标，

力气往一处使，中国才能快速进步。

中西社会组织方式都是特殊的，我并不想分高下优劣，也反对分高下优劣。我想说的是，因为历史轨迹不同，以美欧社会模式衡量中国社会进步的程度并不恰当。把中国社会分成“上中下”十多层，称占半数中国人口的农民是“弱势群体”，夸张拥有某类财产的“中产阶级”的作用，等等，对中国社会问题的解释力是大可怀疑的。其必然结论是要求中国社会以集团为单位进行博弈，要求利益博弈的公开化、合法化，从而使“人民共和国”成为利益集团的共和国。就这个意义而言，社稷立体网络的解释力强于基于阶级分析方法的社会学分层理论。

## 破与立中的中国模式

综上所述，笔者冒昧认为，中国模式三位一体，由民本政治、社稷体制、国民经济三个子模式共12个支柱构成。

社稷体制塑造民本政治；民本政治保障社稷体制也塑造国民经济。亦可称，政治模式是首脑，社会模式是躯干，经济模式是翅膀。如此的中国模式，以较低的代价形成，后来居上，前三十年迎风破浪“击水三千里”，后三十年驾着苏联模式和美欧模式两股旋风冲天而上。因其体量巨大，不妨称之为“鲲鹏模式”。鲲鹏是《庄子·逍遥游》中描述的一条巨大的鱼；这鱼嬗变为巨大的鸟，腾空而起，即鲲鹏。据庄子说，这鲲鹏“背若泰山，翼若垂天之云；水击三千里，抟（“抟”，音义皆同“团”）扶摇羊角（“扶摇”及“羊角”为两种旋风之名）而上者九万里；绝云气，负青天”。

“人民性”，即中华“百姓福祉”不可分割的整体性，是社稷、民本、国民三位一体的中国模式最突出的特点。由此，中国模式亦可称为“人民民主”。正因为人民性，以民为本，官民一体，国民一体，共同努力，我国经济比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发展得更快、更平稳。

搞国家社会两分，官民脱离，信奉法条主义，资本至上，丧失了“人民性”，我国就出现了成堆的严重问题，就呈现普通欠发达国家的社会矛盾。

中国模式当然有缺陷，正如世界上的所有模式都有缺陷。然而，中国六十年的巨大进步正是在这个体制下取得的。肯定这个进步，发现这个进步的原因，是笔者总结中国模式的动力。

思想上的破与立是当代全球生存竞争的主战场，思想斗争的能力攸关中华文明的兴衰续绝。思想战线上的竞争有两大任务：第一是解构所谓“普世”价值，把一个药方（由“民主、宪政”两个抽象名词组成）包医百病的荒唐道破；第二是实事求是地总结中华的生存方式，给出让知识界信服的关于“中国模式”的阐述和理论解释。一个是破，破一个国际性的霸权

话语系统；一个是立，在我国知识界确立对自己生存方式的自觉，也就是对中华发展道路的自觉。上述中国模式就是在试图总结中国的生存发展之道，挑战了国家与社会两分及市场与干预两分的西式教条，更挑战了民主与专制两分的新蒙昧主义。

（作者：北京大学中国与世界研究中心主任）